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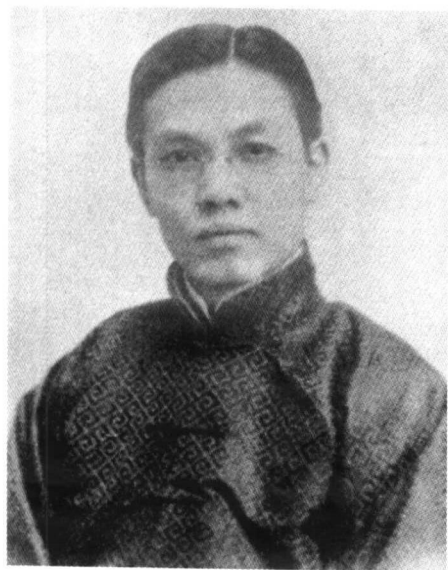
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创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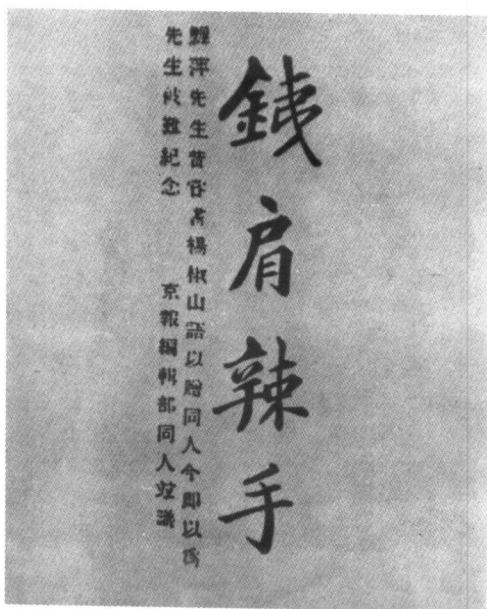
王韬像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



邵
飄
萍
像



飄萍先生嘗寄書楊椒山語以贈同人今即以爲
先生訃辭紀念
京報編輯部同人泣識

錢肩辣手

邵飄萍手书“铁肩辣手”



瞿
秋
白
像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



穆青像



范长江像



1938年8月，在保护武汉战斗中，长江(右一)访问前线。



作者简介

薛飞，江苏徐州人，1966年5月出生。1988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199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1993年毕业后到人民日报工作至今。

15000 / 05

在中国近现代记者中，声名煊赫、健笔凌云的不乏其人，他们用如椽巨笔记录了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追寻中国近代报业的源头，便会看见一个傲然高蹈的孤独者，他就是在近代报业乃至政治领域具有深刻影响的风云人物——王韬。

不作人间第二流

——王 韬

投身西学，眼界大开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上海 1843 年开埠，成为通商口岸。最早进入上海的外国人中，成分很复杂。除了明火执仗的强盗，也有一些是从事西方文化和宗教传播的，由于这些人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仅仅了解一点皮毛，需要中国人辅助他们工作，于是，一些落拓文人开始进入外国人开办的文化机构，为他们服务。

一天，在英国人办的墨海书馆里，忐忑不安地走进一个 20 多岁的中国后生，他的名字叫王翰（后改名为韬）。他是江苏昆山人，

少年时就才华横溢，放浪形骸。到墨海书馆工作，王韬很矛盾。对于“天朝”的臣民来说，给外国人当差是十分耻辱的事情，不久前，王韬自己就曾疾言厉色地斥责一位到上海某洋行谋职的朋友是“处身之道未得”，认为到洋行谋职是“非分之求”，现在居然自己也到这样的地方来了，自谴和无奈使他心里很不安。他在墨海书馆的工作是帮助传教士们疏通、润色文句，通过编译书籍，他了解了不少西方天文、地理、历算、舆图等格致之学，渐渐地，他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起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眼界的扩大，王韬逐渐领悟到，西方的格致之学，是实实在在的强国之策，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1853年，王韬与艾约瑟合译了《格致西学提纲》一卷，提纲挈领地介绍了算学、光学、电学、声学等各种科学技术知识。继而又与艾约瑟合译了《光学图说》一卷，与伟烈亚力合译了《重学（物理学）浅说》一卷。王韬在墨海书馆13年间所参与翻译的西方著作还有《华英通商事略》、《西国天学源流考》、《泰西著述考》等。

与此同时，王韬还兼任墨海书馆传教士所办的刊物《六合丛谈》的中文编辑。《六合丛谈》原先主要宣传宗教，后来科学知识占了大部分篇幅。王韬还时常参加传教士的宗教活动，基督教的教义成为他精神生活的营养之一。对于富有批判精神的王韬来说，在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深厚背景之外，又了解到许多西方的科学知识，从而使他的思想更加丰富与庞杂。

王韬少年时代虽然恃才傲物，但功名之心并没有泯灭。上海几年甘为西佣的生活，使他感到难免为人诟病。他的爱妻在一次回乡的时候患病不治，很快撒手人寰。世事的偃蹇使王韬不免又感到几分懊丧，功名之思复萌于心。在一封信中，王韬流露出一不甘寂寞的心理：“桐叶已落，槐花正黄，见人家泥金编帖，功名之

念，未尝不稍动于中。”他时常与同样被传教士延聘于墨海书馆的数学家李善兰等人持壶买春，驾舟捉月，纵情青楼，也时常与友人抵掌雄谈，纵论天下。酒酣耳热的时候，王韬往往“眦裂发指，或为阮籍哭途，或作灌夫骂座”。旁人不解，目为狂生，渐渐地，王韬成了上海颇有知名度的名士。

虽然王韬当时所接触的大多是自然科学知识，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尚未遭逢，但毕竟已经比一般中国知识分子见多识广，西学已经在他心中激起救国热情。久处江湖，不为当局所知遇，也让他感到缺乏中国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成就感。王韬开始寻求与当局官员的接触。

此时，王韬的一个朋友被两江总督曾国藩聘为幕僚。1859年初，王韬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通过他向曾国藩陈述自己的见解，以影响曾国藩的政策措施。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韬当时的思想状况。清朝的文字狱使人噤若寒蝉，王韬的信自然要字斟句酌，考虑当局的承受能力。但是，王韬此时对时事的看法和对西方科技政治的了解还很片面、肤浅；所提出的致强之策也就难以为当道所采纳。他指出西方列强对华贸易是对中国的掠夺，并有可能使将来中国的纲常名教“浸成西俗”，在信中他依然指斥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认为西方人所优于中国人的是形而下的“器”，而中国人形而上的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是不可动摇的，西方“男女并嗣、君民同治”不足效法。这封信反映出来的思想仍然是传统的历史变易观和历史循环论，但同时他又积极提出要励精图治，亟图振兴。当冯桂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极为欣赏，“以为近来谈西务者，当以此为左券”。但曾国藩对王韬的信似乎并未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王韬继续博览群书。在他阅读的书籍

中，新书、西书的比例大大增加，他逐渐了解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容，广泛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逐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同时，他还把西书推荐给一些官员，如上海道台吴煦、江苏巡抚徐有壬等。

左右夤缘，投机政治

1851年初，中国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同年秋，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清王朝面临深刻的危机。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变本加厉，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身处上海的王韬已经感受到农民起义的浩大声势，尽管他的第一反应还是要剿灭起义，但他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更加担忧。在给江苏巡抚徐有壬信中，王韬指出：“当今天下之大患，不在乎贼而在御戎，何则？乱之所生，根于戎祸之烈也。”

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时候，王韬慨叹：“男儿在世事业多，安肯低头弄故纸？平生学剑愧无成，弄此毛锥已足耻。”他已经坐不住了。然而他没有一官半职，只有通过上书当局，以图见用。所以他在这一段时间，屡屡上书，就变政、平贼、御戎阐述自己的观点。1858年至1859年，王韬接连给江苏巡抚徐有壬上书数十封，论御戎平贼之策。还上书上海道台吴煦，建议加强海关对外国商人的查缉，提出办团练，设保甲，防范太平军。

为了避免与太平军发生军事冲突，西方传教士与太平军建立了联系。1860年初夏，艾约瑟等人应邀率一大批西方传教士赴苏州与太平军谈判，王韬陪同前往。这次经历使王韬对太平军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了解。返回上海后，王韬就将所见所闻进行总结，拟出方略20条，上书江苏巡抚徐有壬，以备当局“万一之采”。徐

有壬接到信后，遂请他代为具体擘画。王韬于是接连写了《与某当事书》、《上当事书》、《条陈管见十四条》等札，为消灭太平军献计献策。如后来被清政府采纳的雇佣外国人组建洋枪队以对付太平军的对策，就是源自王韬。1860年10月，王韬又接连上书正在指挥清军作战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剿灭太平军出谋划策。由于他跟随外国人与太平军接触，清政府终究对王韬并不放心，而王韬屡屡上书，建言变政改革，也并不都符合当局的心愿，清政府对他始终只是“用其言而弃其人”，根本没有“降大任于斯人”的意思，后来虽给了一个上海诸翟团练局董事的职位，这对于有着鸿鹄之志的王韬来说，未免有被人轻视的感觉。他感到生不逢时，时常扼腕太息。

作为上海诸翟团练局的小官，王韬心里虽然不很满意，但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在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时，王韬派人暗中打入，作为消灭小刀会的内应。后来事情败露，有人反而说王韬“暗通长毛”，他竭力为自己辩解，当局虽然没有惩办王韬，但对他还是不太信任，令王韬无可奈何。费尽心机的王韬不为当局所重，太平天国的浩大声势又使王韬对清政府的结局产生了怀疑。于是，他真的考虑向太平军靠拢了。

王韬曾经数次随传教士到过太平天国占领区，与太平军有过一些接触，太平军“求贤若渴，待士如宾”的态度也给了王韬深刻的印象。1861年底，王韬在回老家的时候，结识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颇受器重。于是，他于1862年初以“黄畹”为名、“兰卿”为字向刘肇钧上书，为太平天国进攻上海出谋划策，并请刘肇钧将信转呈忠王李秀成。

由于王韬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又与清朝的官吏有接触，因此所策划的谋略对清朝政府十分致命。这篇4000字的《黄畹上太

平天国书》提出，不要与外国人正面树敌，缓攻上海，先除盘踞在安庆的曾国藩，认为曾国藩是太平军的心腹大患，先攻上游，然后顺势而下，围困上海，断其门户，待其自乱，里应外合，上海不攻自下。这封信的观点十分具有战略眼光，是切中清政府要害的上策，如果太平军依计而行，或许历史将要重写。可惜太平军已经决定进攻上海，久攻不下，而南京又被围，太平军无心恋战，匆忙回防。在清军反攻的时候，这封信还放在刘肇钧的帐中，遂被查获。

继徐有壬而任江苏巡抚的薛焕看见黄畹的条陈条条皆中要害，大惊失色，星夜呈报朝廷。李鸿章阅信以后，感到其中“颇得贼与西人交接之情”，急报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则立即呈报同治皇帝。同治皇帝阅后惶恐不安，降旨“着曾国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网”。

当时王韬正打算从苏州回上海，忽然听说官军已经缉获此书，而且已查出作者，自己已被通缉，于是赶快到昆山乡下躲避，清军一时无法将他缉拿归案。墨海书馆主持者英国传教士慕维廉获知此事后，怕王韬贸然回沪落网，预先向苏淞太道吴煦查探“黄畹”所犯何事，并为王韬求保。吴煦诈称“无甚妨碍，尽可放心”，并为慕维廉立了字据，要慕维廉把王韬带到他那里，保其无事。但吴煦对王韬的嫉恨，王韬心里是有数的，他并不相信吴煦的承诺。在潜回墨海书馆以后，不愿随慕维廉去见吴煦。吴煦闻讯派兵前来捕拿，英国人认为吴煦出尔反尔，拒不交人。英国领事麦华陀是麦都思之子，与王韬相熟，他出面将王韬接到领事馆避难，王韬因此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呆了 135 天。

缉拿不到王韬，同治皇帝十分恼怒，再次责令薛焕等查拿，声言如果日久仍然不能擒拿，就“将疏纵逃官各罪，一并惩处”。官

府只得与上海英国领事交涉，要求引渡王韬归案。麦华陀予以坚拒。不久，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英公使团提出要求引渡王韬的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依然严加拒绝，指责清政府的欺诳行为，并为王韬辩解。清廷交涉未果，只好在英国领事馆外面遍布密探，同时在街道、码头明察暗访，伺机捕获王韬。卜鲁斯指示麦华陀切实保护王韬安全离开上海，暂避风头。麦华陀于是写信给父亲的老朋友、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请他接纳王韬。在麦华陀的庇护下，王韬化装离开英国领事馆，登上英国怡和洋行的邮船，从上海前往香港。

漫游欧洲，译介西学

王韬到香港后，改名“瀚”为名“韬”，意为收敛锋芒，韬光养晦。理雅各邀请他参与翻译中国典籍，王韬先后参与翻译了《书经》、《诗经》、《春秋左氏传》、《易经》、《礼记》等书，这些书合称为《中国经典》。由于王韬对经学颇有造诣，对中国古代文化了然于胸，因此能博采众长，比此前介绍中国经典的同类译作质量明显提高。理雅各对王韬在翻译中国典籍中所作的贡献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不可或缺之人：“余固未见有人能及于王博士者也。”

香港当时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统治者在香港按照自己规划的风格发展资本主义。原来的丛莽恶石、盗兽之窟，数年间“遂成市落，财力之盛，几甲粤东”。对此，王韬不禁慨叹：“观其地之兴，即知其政治之善。”数年的香港亲历，加深了王韬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进一步探索的愿望。

在香港、广州，王韬还结识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中有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同在英华书院负责印书事务的黄胜，有中国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等人。对西方了解得越多，王

韬越感到中国亟须变革。但作为清政府缉捕的逃犯，王韬不敢贸然上书。1864年，他代黄胜写了《代上苏抚李宫保书》，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会轻易被外来文化改变，中国文化又具有不断变异更新的优点，因此在书中他提出师夷长技，去害就利，无伤“风俗人心”。他认为变法自强宜自上而下地实行，需要依靠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大吏来推行。自从这一次试探性的上书后，渐渐地，王韬又开始给当局官员频频上书，建言献策。

1867年，理雅各回国省亲。在5年的时间里，王韬与理雅各共事十分默契，也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友谊，王韬遂撰《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以资纪念。年底，理雅各来信邀请王韬到他的家乡英国苏格兰去续译《中国经典》，这对王韬来说是意想不到的好事，他欣然应邀前往。

和当时具有改良思想的人士相比，王韬是幸运的。对西方的了解不再只是雾里看花，而是跨出国门，去欧洲实地考察，接受西学的熏陶，这对他后来鼓吹变法自强增加了丰富的思想储备。

王韬途经新加坡、槟榔屿、苏门答腊、马来西亚、锡兰，从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到达意大利，然后从马赛穿过法国，渡过多佛海峡到达英国。在开罗时，他第一次坐上了“轮车”（火车），惊讶不已。在途经法国时，王韬稍作流连，活灵活现的“影戏”（电影）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巍峨雄伟的凯旋门令他叹为观止，卢浮宫的精美绚丽使他终身难忘，他还拜会了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先生，探讨中国文化的翻译与传播问题。

在英国，他帮助理雅各翻译中国典籍，并到欧洲各地参观游览。欧洲的自然风光、现代科技和文化令王韬赞叹不已。他看到往来穿梭的火车给工商经济带来的巨大便利，看到电报给信息传递所带来的巨大飞跃，看到煤气、电灯、洒水车给市民生活带来

的方便实惠。对比沉闷、落后的中国，他感到恍如隔世。

王韬两次到伦敦游历，并专门参观了国会。议院的宏大建筑令他感慨万千，而这里进行的就重大事情的讨论和辩论更让王韬感到震撼，他对英国君主立宪的制度羡慕不已。

在英国期间，王韬不但全面学习吸收西方进步的东西，而且积极传播中国文化。《中国经典》的出版提高了王韬的知名度，各大学、教会、民间团体竞相邀请他讲学。在牛津大学、苏格兰大学、爱丁堡大学等著名学府，王韬指责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提出中英两国应该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他向英国人民介绍中国文化，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认为世界终将达到“大同”。1870年2月，王韬与理雅各一起返回香港，结束了两年多的英国之旅。欧洲之行，王韬亲身体验了西方的生活，较多地了解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这对于他后来的思想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回到香港以后，王韬便开始搜集材料，向国内介绍西方历史与地理。相继集成书的有《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法兰西志》、《美利坚志》、《西事凡》、《四溟补乘》、《俄志》、《台事窃愤录》、《漫游随记》等。在传播西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可以说是王韬史学著作的代表，前者是国别史著作，后者是当代战争的记录。《普法战纪》在《华字日报》连载时，未及付印消息就不胫而走，次年战争结束，集成书出版后更是轰动一时。两本著作材料都很新颖丰富，王韬在书中积极评价共和政体，介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事迹与思想，记录了巴黎公社的事迹，还最早翻译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歌曲《马赛曲》。王韬的西学著作所提供的材料比此前19世纪四五十年代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要丰富和精确得多。

王韬西游时，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事业感触很深，认为国家要强盛，必须有发达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他决心在这方面作一些努力。他与友人在香港创办了第一所医院，后来又与友人共同倡议设立“香海藏书楼”，以广新知，还建议设立“博物院”、“博览馆”等。他与黄胜创办的“中华印务总局”对普及推广新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创 办 报 纸 ， 鼓 吹 变 革

在编译介绍西学的同时，王韬还先后担任了香港《华字日报》的编辑和撰稿人，并一度担任《华字日报》的主编。1871年，英华书院停办，王韬与黄胜集资买下该书院的印刷厂，易名为“中华印务总局”，排印出版具有维新思想和西学新知的著作。在此基础上，1874年2月4日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在第一批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当中，它的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

《循环日报》是一张以商业报纸面目出现的政论报纸，创办伊始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外国人在中国办报，实际上是从期刊开始的，第一张英文日报诞生于1857年，中文日报出现于60年代，到王韬创办《循环日报》的时候，中国人自己掌握的中文报纸还寥寥无几。1873年汉口《昭文新报》旋办旋停，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872年由英文《德臣报》的一个中文版《中外新闻七日报》改名而出的《香港华字日报》和由英文《孖刺报》分离出来的《香港中外新报》，能否说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目前尚有疑义。而《循环日报》筚路蓝缕，且能够坚持那么长的时间、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这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不能不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王韬在《循环日报》的开张布告中写道：本局“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由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

比”。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这一点甚为重视，认为这是摆脱西人束缚、发表独立见解的前提。他说，自中西通商后，香港、上海相继仿效流行报纸，但“主笔之士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辞命意，未免径庭……欲矫其弊，则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循环日报》编撰人员的“中国籍”和兼通中西学、汇世界意识与爱国情感于一炉的“兼容性”特点，是《循环日报》得以成功的一个条件。

黄胜在《循环日报》创刊之前的 1873 年 5 月就离港赴美，因此报纸由王韬独自主持，他的助手有后来成为他的女婿的钱听伯、广东秀才洪干甫等，胡礼垣 1879 年起也曾在该报任职数年。

《循环日报》的报名很特别，对它的寓意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认为，“循环”的意思是指“太平天国的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可借报纸传播其种子，以致循环不已”；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认为，王韬所谓的“循环”是他心目中亘古不变的“三王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政治思想；美国学者科恩则认为王韬选择“循环”一词反映了他的循环史观，同时也可能隐含着王韬的信念，即中国一定会重新变成原初那样的伟大国家。

《循环日报》创刊号为书本形式，以后日出 4 开两张，一张用机制白报纸印刷，主要登载评论和新闻，一张用土纸印刷，专刊船期和行情，除星期日外每日发行。每年银价五元，每月半元。

报纸的第一版为行情版，版侧题有“香港目下棉纱花匹头杂货行情、各公司股份行情”。第二版为新闻版，分数栏：1.《京报全录》（后改为《京报选录》）；2.《羊城新闻》刊登广州和广东省的新闻，以首要地位登录《督抚宪轺报》，也不时出现野语、稗史之类的内容；3.《中外新闻》首登评论基本上每期 1 篇，有时登 2 篇甚至 3 篇，后登广东以外的国内新闻和国外新闻。第三

版刊登航运消息和广告，第二版《中外新闻》栏内未登完的内容也常转到这里。第四版刊登广告和启事。这种体例和模式是当时香港报纸的流行格式，在创刊后的十年中没有大的变化。

王韬在不为当道见用的情况下，避居香港，又到欧洲游历两年多，回国以后，虽然仍然心有不甘，继续上书，但依然没有他所期望的反响。接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与黄胜继续传播西学，进而创办报纸作为喉舌，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王韬一个无奈的选择。因为当时的“正途”还是科举之路，办报往往被认为是穷途末路文人所作的不得已的选择，王韬一方面对科举十分厌恶，另一方面又对仕途有所留恋，可惜上书太平军，在政治上押错了宝，使他成为清政府缉拿的罪犯，绝了仕途，空有满腹中西学问，难以见用于当道，于是操起了办报的行当。

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是为了把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宣之于世，而体现他思想的就是言论。美国学者保罗·科恩教授指出：“在近代中国史的初期，报纸一般都是作为专门赚钱的手段，几乎没有对社会各种问题表示态度，或努力影响舆论的。王韬的报纸是一个例外，其显著特征，就是几乎全由王韬亲手写成的定期政论。”据日本学者西里喜行的研究，单根据日本国会图书馆及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明治文库所藏的不完全的《循环日报》和《申报》所转载的文章统计，《循环日报》从 1874 年 5 月 12 日（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到 1885 年 12 月 10 日（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五日），就发表了政论文章约 890 篇。这些政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王韬的手笔。为了撰写这些评论，王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他在一封信中叙述当时马不停蹄地“握管连写”的情形说：“自撰日报以来，境比丝纷，事同猬集，终日握管，手为之疲，几于万言倚马……虽笔墨之间，不求刻画，而才尽之叹因之。”